纪念张锡纯诞辰160周年系列报道

医道本同源 施术有殊途

本报记者 刘 伟

时值中医大家张锡纯诞辰160周年，沧州市张锡纯思想研究会会长、市中心医院中医科主任吕旺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中医临床实践，提出中西医之间的互相兼容、各取所长，正成为现代医学未来发展方向的观点——

吕旺参加“文化八仙桌”系列访谈活动

两大医学传统 终会“相遇相知”

“从医学发展的本质上来说，中西医学同为治病救人而存在。二者一源两歧，而又殊途同归，面对的是相同的病人，相同的症状、体征，相同的辅助检查。”在近日举办的沧州市第四届张锡纯思想学术研究会上，吕旺阐释了自己对于中西医结合的看法。

在他看来，“得出这样的判断是有科学依据的。比如，中医提到肺与大肠相表里，西医则从组织胚胎学的角度观察，认为肺、气管由原肠的前肠发展而来，呼吸道上皮和腺体由原肠内胚层分化而来，肺、气管与大肠的结构来源是相同的，恰恰说明了中西医在一些理论基础上是相通的。”

随着现代医学的逐步完善与发展，中西医结合治疗，在很多方面都呈现出兼容并蓄的趋势，上演着一出出“相遇相知”的杏林大戏。

“现在可以借助先进的医学理念和技术，看到中西医结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。而早在民国时期，大医张锡纯就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思想，并用他的毕生心血著成了中西医结合第一可法之书——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，可见这本书有多高的学术价值。”

吕旺认为，今天要传承的，不仅是张锡纯的医术，更要学习他在医学上不断开拓创新、包容并蓄的精神。

“疫情期间，国家倡导中西医相结合共同施术，对疫情的防治和治疗起到了1+1>2的效果。这也用事实再次证明了中西医结合是可行的。二者有机、合理的结合，必将事半功倍、相得益彰，但前提是必须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根本，辨证论治为准绳，绝不能生搬硬套、胶柱鼓瑟。”

无论中西医疗效是关键

“中医曾几次面临被废除的困境，但凭借顽强的生命力又一次次重新站了起来。”无数次临床实践，让吕旺一次次反思这样一个问题：中医的生命力究竟在哪？

“是疗效，也只能是疗效。疗效是中医的根，也是振兴中医的关键所在。没有疗效，中医就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中医是一门实用科学，不是挂在墙上的字画，好不好都不会害人，中医是有效就有用、无效就有害。我认为这是中医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、并且在实践中必须解决好的问题。简单地说，只要能达到让病人满意、认可，中医必兴。换位思考，假如我们是病人，希望找什么样的大夫看病，那么现在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大夫。”在吕旺心中，只有这样才是真正践行了“大医精诚”。

清代温病大师叶天士曾告诫后代子孙，非天资过人且责任心极强者不可为医，否则治病救人不足，反成操刀杀人之巨贼。

纵观中华文明史，中医药事业发展过程中的成果璀璨夺目，从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杂病论》到《本草纲目》等不胜枚举。吕旺提供了一组对比数据，清代之前，同时期欧洲人的平均寿命要比中国人短。这说明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中医对人们的身体健康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“确保中医疗效最关键的前提，就是要坚持辩证的医治。这种治病的基本原则不会过时，而是正当其时。”这是吕旺临床实践过程中最深切的体会，“我诊疗的过程，无一不坚持这一原则，曾多次成功救治了急性心梗、脑出血、重症肺炎等重症病例。另外，对于肠粘连、肠梗阻这类病人，西医多采取手术治疗，然而手术本身就是一种创伤，可引起甚至加重粘连，造成恶性循环，此病中医称之‘结胸’‘关格’，我自创一方六法，自拟通腑汤为主方，再配伍攻下、活血、理气、温通、益气、化饮，取得明显效果。”

坚持辩证的医治不仅是中医施治原则，也应在中西医结合的探索中把握好这一原则，而不能简单机械地融合。“如果简单地将清热解毒药当作抗生素，将活血化瘀药当作血管扩张药来应用，只会落个‘邯郸学步’的结果。”吕旺说，这既是中医原则，也蕴含哲学智慧。

共建现代医学体系 兼收并蓄各取所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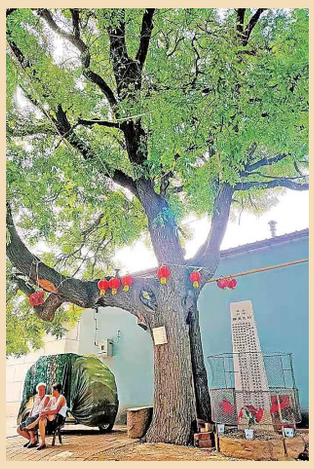
杏林春暖迎新枝，中西结合利苍生。吕旺感慨，世间病苦如此之多，只要能减轻病人痛苦，何必再有中西医的成见。更何况，理论和实践都已渐渐证明，中医西医同源，只是施治有所分别。

吕旺说：“中医讲究宏观辨症，西医擅长微观辨病；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收集资料，西医借助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标准化检测，各有所长。以中医为例，中医强调整体观念，提倡未病先防，这些都为现代医学更好发展提供了更全面的基础理论。西医借助微观体系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，提高了整个现代医学的眼界。比如之前，中医认为不能服药就失去了治疗的机会，而西医的静脉注射就解决了这一难题。”

深知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性，也为了促进沧州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，吕旺率先倡导成立了沧州市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会，并成为首位会长。

“研究会成立于2017年，如今已连续举办了四届学术专题研讨会。下一步，我们将利用网络技术进一步推出医学专题，旨在培养更多的新人，这或许正是张锡纯老先生所期望的。”

吕旺说，让他受益最深的是张锡纯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自序中所写的几句话：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，故学医者，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；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。这位大医深刻明白，一枝独秀不如春色满园，凭自己一人之力穷极一生能治愈多少病人？只有将自己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播出去，才能真正做到“济世活人”。


上河涯村的古槐 白世国 摄

“文化八仙桌”系列访谈第129期

古城街巷 文韵回响

本报讯（记者祁凌霄）城市改造中，如何保留历史记忆，是文化能否更好传承的重要问题。街道更名中，如何彰显地方文化特色也是重要问题。当前，城市改造和沧州街巷起名正在进行之中，慎改，改好，广泛征求民意，充分尊重沧州历史，保留特色文化，命名文化街巷，是各方都在密切关注的话题。11月29日，“文化八仙桌”系列访谈第129期，将邀请有关人士，在线上对此展开讨论。

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市文联原主席魏新民，摄影师宗增顺、陈立新，历史文化爱好者张耀华。作为作家和市文联原主席，魏新民在沧州文化建设中作出不少贡献，对沧州文化的整体格局和走向表示出极大关注。在任期间，沧州文学、书画、篆刻、民俗、工艺美术等文化种类，取得突破性成绩，为以后沧州文化的发展夯实了基础。宗增顺和陈立新多年来坚持拍摄沧州的地标性建筑、老街牌、老街巷，积累了丰富资料，许多图片里的街巷，目前已经成为历史，或旧貌换成新颜。张耀华热心沧州历史文化并撰写过很多有关老沧州的回忆散文。

目前，沧州尤其是大运河畔还有哪些老街巷，现状如何？历史上的老街巷曾留给一代代沧州人哪些回忆？看似寻常的巷陌里，曾发生过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，给城市打下哪些文化烙印？当代城市改造中，结合社会发展，能否给那些典型的老街巷容身之地，供人在心灵和文化上以诗意栖息？老街巷的局部改造应注意哪些问题？街道更名，如何保持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又能避免历史久远带来的生疏生涩感？如何广求民意，起出既有历史文化气息、又能突出街道本身文化特色的时代性前瞻性的名称？

这些群众所密切关注的问题，都将在访谈中展开。欢迎感兴趣的读者扫码入群，参与讨论。

时 间：29日上午

电 话：18833783089

“文化八仙桌”系列访谈

主办：沧州日报
承办：沧州日报《人文周刊》

以展厅为可观性文化艺术品展示的方式，是当代人的优选。近年来，大小展览层出不穷，观之不暇，展厅文化已俨然成潮。展厅，使文化艺术品与大众距离更近，增强了创作者和大众的交流，也使组织者和主办方有了沉甸甸的成果感。然而，在书斋里蛰伏了数十个世纪、颇具专业意味的艺术门类，能否在潮流裹挟之下潇洒弄潮，入乎其中出乎其外，既能与时俱进，又能不落俗套、保持本色的文化特质？直面展览潮，对于比书画更为小众、更为书斋化的篆刻艺术，努力保持潇洒出尘而又能潇洒入尘，有哪些可贵的新探索呢？

开拓展厅与书斋新意象

——大国文懋·金石寿永篆刻展走笔

本报记者 祁凌霄

沧海印社在新华区美术馆举办的大国文懋·金石寿永篆刻展，日前已经落幕。这是今年以来沧州最大的一次专门的篆刻精品展。落幕后的寂静里，对展出得与失的反思，更便于沉淀升华。

新华区美术馆坐落于明清时期沧州府衙旧址。府衙惟一保留下来的古建补山楼，就是美术馆。补山藏海的器局和凝重，与篆刻这一古老艺术气息相融。篆刻展选择此地，先声夺人。开幕式后的次日，展厅人潮渐已退去。人潮退去是好事，艺术欣赏不是赶集，走马观花能得到什么呢？疏疏落落三五人，从从容容“读”艺术，在展厅的宁静古穆里，与文化进行灵魂的沟通，称得上由欣赏而至心赏。

用心选择场地之外，展览的方式，也透出展览方的创意。一楼，专设展柜，玻璃罩下是这次展出的部分原刻原石印蜕。这些原作，被组织者从作者的书斋里请出来，集成队列，安详地卧在展柜里供人观摩。从石材到印纽，从边款到印文，到布局到刀法，想必参观者在指点评论中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新意。书斋里的那份个人独有的幽情，一下子就扩充到展厅，传递给大众。

书斋与展厅两种迥然不同的观赏环境，形成两种不同的观赏心理，也难免让观者产生疏离感。在展示方式上既能承接传统，又能别出新意，是目前展厅文化的一大课题。大规模展出原刻原石印蜕，在全国的当代篆刻艺术展览里是罕见的。这些原石原刻和印蜕，收集、运输、布置起来不是个轻松事，但案头玩赏历来是篆刻艺术的文化传统之一，让它们在展厅文化之下的大庭广众里亮相，也是沧海印人颇具创意的奇思妙想。

展柜西面不远处的近门一角是书案。那天，西泠印社理事、沧海印社社长韩焕峰刚走，由西泠印社社员、沧海印社执行社长李泽成当班。当班，其实是展览方派专人在现场为参观者提供艺术咨询、演示性创作。“这是大篆，这是小篆。秦印多界格，汉印多方整……”由于篆书和篆刻的专业性，满足一般观众了解基本知识的需求，便成为当班人的工作之一。“这方印我看着挺好，但又不知好在哪里？那方印我看不出好在哪里，但作者为什么还那么大名气、经常获奖？”回答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，是当班人的工作之二。另外便是为参观者现场演示。

艺术家在现场专门而不是随机解答问题、现场演示，这又是沧海印社在这次展览中一个崭新创意。这样一来，篆刻艺术和专业知识传播的社会效果无疑会更好。

展览还延续了目前篆刻展比较新颖的一种方式，即多件篆刻作品制成印屏，如书画般悬挂，再于印屏旁边将原作放大后的二次作品悬挂起来，以适应不同于书斋的展厅空间。

创作、展示工具演进、场合变迁历来影响着文化艺术。唐代高桌的出现，改变了此前席地而坐的书写方式，进而影响了执笔方法，形成不同的艺术面貌；明代高堂广厦的出现，大幅悬挂卷轴开始流行；元末文人王冕开始在石头上刻印，至明代经大量文人参与，形成当代意义上的篆刻。在文化艺术大盛的今天，有些书画作者曾为取得展厅效果拼贴制作染色，使艺术饱受日趋工艺美术化的诟病，已被国家级展览叫停。而面对过度夸张变形、意在哗众、消解汉字、背离艺术传统的作品，目前人们已经产生审美疲劳乃至厌恶，但还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。篆刻作为比书画更小众、材质体量更小的艺术门类，在展厅文化之下探索形式上的适应度，显得较为稳健妥贴。

书斋，是书画、篆刻艺术创作最基本的场地，在野外或作坊里制作的青铜摩崖碑碣，也兴盛了几千年，但取代不了书斋的主要地位。况且，现在青铜摩崖碑碣已成偶尔为之的创作。

书斋文化与当代展厅文化，在形式和内容上是相合相离的。展厅文化迅速兴起兴盛，变化迅速，是信息化社会的产物，但大风飞扬未免扬尘，浪潮滚滚未必无沙；书斋文化古今一体、静水深流、变迁舒缓，是深植文化血脉中的传统，但也可能限于孤芳自赏、脱离大众。

在书斋里的创作，和于展厅文化的大势又不趋附屈从，能为群众所赏而不媚俗，是形式之外，当代真正的艺术探索者思量的另一大课题。

大国文懋·金石寿永篆刻展展出的作品中，社长韩焕峰的作品，在方正沉静冷逸中，延续痛快酣畅的基调。如此，则消解了一般人追求豪放而带来的粗砺气息，使动者愈动，静者愈静，所谓衰年变法，归于老辣平淡的多种况味；执行社长李泽成擅元朱文，元朱之外，他特意放大对自鸟虫篆思考借鉴后的作品，吸收了鸟虫篆华茂的形式，而摒弃了繁冗的刻意象形，呈现出篆与汉字紧密结合、又对鸟虫象形点到为止的含蓄；西泠印社社员、副社长孙长铭的作品，上追秦汉至商鼎周彝，高古的调子里透出憨拙与活泼；实力派作者孙宏伟，以先秦楚简帛为法乳，雕刻出一片迷离恍惚内蕴空灵的气象，黑底白字的长款边拓与印文呼应，穿越到两千余年前的荆楚山水间。

其他作者或汉印、或玺印，多在传统中融入自己的理解。年轻作者如李宝棠，虽在父亲李泽成的指导下进入篆刻之门，但他的作品，吸收青铜器上云雷纹、饕餮纹等手法，张扬着年轻人不甘人下的求索精神。

在文化艺术上，回溯传统、坚守传统是一种创新。如王羲之的七世孙怀素，写800本《千字文》散于浙东诸寺，传播王羲之笔法，赵孟頫矫正宋代“尚意”书风的流弊，以恢复魏晋笔法为己任。在文化艺术上，结合时代、探索新意也是创新。如八大山人、徐渭、王铎等人。不过这两种都需扎根传统，汲取历史天空和江山胜迹里人们所能共赏的美。普通群众，也需养成一双欣赏艺术的慧眼。

如此说来，在展览现场“这方印我看着挺好，但又不知好在哪里？那方印我看不出好在哪里，但作者为什么还那么大名气、经常获奖？”这样的问题对于勇于探索的艺术者来说，并不是轻飘飘的一问。因此，开拓展厅与书斋新意象，仍需在路上的艺术家们快马加鞭，勇猛精进。